

# 诗人灵府时代风貌

——刘永济先生《云巢诗存》序

刘庆云

《云巢诗存》一卷，先师刘永济弘度先生手定其诗之一部也。起自一九三九年，己卯，春；止于一九六二年，壬寅，秋。凡二十三年。所历重要时期有三：抗日战争；解放战争；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。此二十三年中，神州大地所发生之变化，诚可谓地覆天翻。其规模之大，程度之深，实非以往数千年中任何时期之变革所能比。先生诗，于其所经历之种种变故，从许多不同侧面，写其心灵深处之感受。歌哭笑啼，声发楮墨。读之，如亲其人，如履其境。

《诗存》共收诗一百五十五首。此次付梓，删去四言诗五首，五言古诗一首，先生遗意也。计存五古十四首，七古十一首，五绝三首，七绝七十七首，五律十九首，七律二十五首。亦可谓无体不备矣。诗之大家，固不仅能为一体而已。

诗之为体不一，用亦各殊。近体专擅抒情，古体亦可叙事、说理；而五古重情致，七古尚气势，又其异也。七古，或主古拗，如昌黎；或多用偶语，如香山。论者以为前者格高而后者韵长，又其派分也。是皆创自少陵；而少陵固有所参借于前代，自不言而明也。世之作者，能为各体，然不能必其工于各体，要视其才力、学养如何而定也。

先生才大而学博。其为学，不仅专其力于诗词。观其所著《屈赋通笺》、《屈赋音注详解》、《文心雕龙校释》等书，学者已惊其学之博而精矣。而于词，尤有其戛戛独造者。诗或亦如之。其所著《词论》、《诵帚彙词》，所选《唐人绝句精华》，海内外已共珍之矣。予昔从同学武汉大学，初读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，凡五载，于先生已深怀景企之情。每逢先生讲授唐五代两宋词，必先至课堂，置身前座，恭聆讲海，受益良多。然尚未能日侍左右，时闻警欬也。及被录取为研究生，从先生专治词学，亦及于诗者三载。光风霁月，旦夕接于绿帷绿野，私心快幸，未可言宣。时，及门诸子及中青年教师多以吴梦窗词为艰涩，不易索解。先生当为讲授如千首，抉微发隐，言简意赅，无不令人慨然于心。近岁刊行之《微睇室说词》，即以当时讲稿为基础写成。视之海绉、铁夫诸人之说，诚可谓后出转精矣。其于诗，予亦曾侧闻其议论，举凡唐宋诸大家，无不究之深而发之精。尝闻能词者未必能诗，反之亦然；盖亦以其体既殊，用亦有别，而作者之性分复各有近也。而先生则兼擅之矣。盖亦以其学之博、才之大足以并驱之也。

诗无论古近体，求其语语惊人，可悬为鹄的，而不可期诸实践。少陵云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；而其《咏怀古迹》中“志决身歼军务劳”之句，夏承焘先生竟斥为“成什么话！”盖事有非主观努力所能至者。大家、名家之别，在于：名家往往有句而无篇，大家则有篇亦有句。先生之作，诚亦大家矣。

先生五、七言古，皆妥贴排募，近于昌黎。其最佳者或亦肩于子美。五古，极富思致；七古则见气势。五古，叙事兼及巨细，议论则是发幽奥；七古则熔抒情、叙事、说理于一炉，淋漓恣肆，如决江河而播华岱。五古《答客嘲》，抒怀抱，洞见肺肝；讥世事，则恍如发于今日。《春晓杂诗》三首，长者十韵，短者八韵。前两者写春晓，后者写杂感，如出陶谢之手。驱辞造语，缀而成章，皆有篇有句。《病起谢郭医》：“无乃小游戏，遂劫造化权。四壁复我有，妻孥复我前。花鸟复我娱，山水复我妍。”复苏情态，跃然纸上。读之，如

闻语笑。其着想出语，恍惚少陵。七古《黑石山之歌》，汇诗骚于一体，汪洋滂沱，莫可估测。而《东坡生日》之作，起以神仙而化夔龙，结以分韵拈阄，弱腕强筭。中间议论宏肆，感情澎湃，有如大江，滔滔东注。至其五、七言律，大多语语精警，篇篇整炼，而其结成较大型之组诗者，则不可删其一二，亦不可颠倒一二。其篇法之精密有如此者。其中，五律《乐山杂诗》，实近于少陵《秦州杂诗》。伤时感事，百感集于笔端。字无虚置，句无泛设。而“未觉羲文远，何愁禹迹穷。”“秦师谁为哭？曹社鬼何讥！”属对极工，用事殊切。“诸生惊健在，旧好喜来同。”“时危身亦贱，士耻气偏强。”“雾中偏的砾，竹外忽横斜。”苍凉激楚，感慨遥深。而其或起以“误读辽金史，徒深九世仇”，而结以“北陵风雨恶，战骨莽难收”；或起以“宿将声威在，名城百战全”，而结以“前埋输万骨，歌吹莫轻怜”；或起以“梅树惊春在，冲寒自作花”，而结以“东湖旧时月，凄绝虏营笳”。皆大起大落，非巨匠莫办。七律，卷中所收，几无一不为完璧。而其中警句，如：“万里乾坤流转尽，百年身世涕洟稠”（《奉酬天冈乐山见怀长句》）；“怒涛不尽遗黎恨，玄雨长霾逐客魂”（《读散文诗集》）；“自有溪山供醉眼，各亲灯火揽营魂”（《四用门存韵有赠》）；“久尝鸡肋知无味，细论牛刀欲尽年”（《喜雨》）；“沂水月窟星源地，甲乙三唐两宋人”（《过天冈寓斋清话》）；“句中离思多于海，画里前游逸似天”（《答和宴池海上见怀韵》）。凝重、高华，在遗山、放翁之间，许丁卯或犹有所未能也。而卷末《寄湘弟》两律，婉转尽其棠棣之情，而又饱蘸身世之感，语语至情，大类少陵夔州以后之作，不烦绳削而自工。是盖诗人大成之境也。

较之五、七言古律体，其所为七绝，在集中不独为数最多，亦别具特色。先生在其《唐人绝句精华·缘起及取舍标准》中，引刘禹锡所谓“片言可以明百意，坐地可以役万象”，梅圣俞所谓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”，以为“尤于绝句为必要之论”。盖“绝句之体裁虽小，诗家皆以为难工”，作者必须“艺术手段甚高，概括力甚强”，方能以此最小之体裁，将客观事物反映于其“思想情感上最切要、最精彩”之部分。而“读者由其已写者可以推想其未写者，由其部分可以推见其全体”，“吟咏之余，觉其情溢词外，状呈墨中，犁然有当于心”。先生于七绝会心既远，所作俱工。大多以清新、雅重之笔，就其难忘而又难状之景与事，写其无穷悲感。不多假于事，而意味深长，耐人把玩。如《易简斋中回忆》之一：“衔尾鼉鼉上鄂城，纷纷覆国破都声。惊尘起处缥緲散，肠断床头两敌营。”《月夜》：“愁似春芜未易删，苦无佳致领高寒。倦来只欲关门睡，荒却溶溶月一山。”其沉郁之思，酷似子美；笔力之劲健，又大类昌黎。虽不似盛唐之高浑，却不落晚唐之纤柔。此虽时势使然，亦性分、才情、学养所致。

近世论者以为有学人之诗，诗人之诗，先生之诗，盖学人诗之高境而又不乖诗人之旨者。席启襄鲁思丈谓先生“乐府追姜白石，诗亦如之”。盖着眼于其诗格之清刚而发。倘总先生之所就，则似非宋人所能限。席丈题《诗存》句云：“唐宋何曾分畛域，从知功力见钜鎚。”殆近之矣。近代以来，学者于诗，多主唐宋混一，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混一。先生之志，盖亦在此。故能“别裁伪体”、“转益多师”而成其大。

先生于《诗存·录稿后记》中，自谓“平生不常作诗，此卷所录，乃违难乐山及解放以后之稿。其中有可与诵帚词互见者，有可补词所未及者。存之，亦可见予生活之片段”，故以“附词集后”。此在先生盖“聊以自备省览”；而在读者，不独可窥诗人之灵府，亦可窥时代之面貌。盖诗之所纪，虽为诗人“生活之片段”，亦乃国家民族之一段重要历程。谓为现代之诗史，亦宜。

《诗存》，先生手录于一九六一年，辛丑，二月，距今二十有七年矣。手迹犹新，墓木已拱。悲涕千秋，空山片碣。倘典范不彰，来者孰法？现蒙湖南大学出版社惠允付梓，潜德幽光，得以宏发，良用欣幸。予自违塵海，近三十年，风尘奔走，碌碌无状。回首师门，深惭遗训。垂白灯前，摩挲遗墨，恍惚犹在春风化雨中也。书此以弁其端，盖就所得于先生之诗者，亦如当日呈缴一短论以当作业也。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，戊辰季秋，受业刘庆云谨序于湘潭大学之北斗村